我思我写

我的“抗战”——《川流不息》写作漫谈

□黎民泰

我相信那句带有宿命色彩的话：一个作家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冥冥之中，早有注定。这是作家的局限和悲哀，也是作家的良心和责任。

《川流不息》是一部关于抗战的长篇小说。在2012年动笔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抗战题材。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川西平原的基层作家来讲，我一直都认为：抗战离我太远，它不在我的文学版图之内。但写作就像投胎一样，总是身不由己。那些注定要出现的东西，早就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你的生命和思想，只不过你当时还不明白而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翻阅都江堰市（旧称灌县）的地方史志时，总会被一段疯狂而又绮丽的历史迷住：大约1930年前后，驻扎在灌县的军阀曾强迫老百姓大量种植罂粟，我故乡的土地上，曾一度成为罂粟花的海洋。“罂粟花的海洋”，这个图景或意象一下就吸引了我。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罂粟，也没有见过鸦片。我只在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那是一种五颜六色的极其妖艳的花朵，那是一种像牛屎一样的黑黝黝的东西。另一个关于鸦片的肤浅印象，就是在乡间修房造屋挖掘地基或者生产队开荒垦地的时候，总会从地下挖出一些比拇指略大的青白色的小杯子。老人们说，这就是“鸦片杯杯”，也就是过去用来分装鸦片膏子的小器具。

尽管如此，故乡这段种植罂粟熬制鸦片的历史，还是像一颗从岁月的烟云中飞逸而出的种子落进了我心里。我很想写写这段历史，写写罂粟，写写鸦片，写写在罂粟与鸦片的媚惑下千奇百怪的生命图景与欲望景观。但我迟迟没有动笔。我发现，仅仅有了欲望与堕落是远远不够的，人心人性还需要救赎。我想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与立意，让整个小说挺立起来，让我的人物从鸦片的邪恶中超拔出来。

转眼到了2010年。我去川西平原某古镇，参观一座由私人出资修建的抗战博物馆，在馆中看见了一杆陈旧的鸦片烟枪，那黄铜锻造的枪杆上，刻着一行骨立的小字：好儿郎，打日本，上战场。我想，这杆烟枪肯定是我故乡某个士兵的“心爱之物”，他不仅在枪杆上刻下了自己的杀敌誓愿，还带着它出川抗战了。于是，代表个人欲望堕落的罂粟、鸦片与代表民族强大救亡精神的抗战，经由这杆奇特的鸦片烟枪，瞬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我的小说站立起来了，人物也超拔出来了。

于是，我开始收集四川的抗战资料。这时，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在播放各种各样的抗战剧，其中不乏解构历史、背离历史的充满着娱乐化倾向的抗战神剧。直至2013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向一位研究抗战的专家请教，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位专家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把我们民族的精神创伤作愉悦化的白日梦处理！”说白了，这就是鲁迅曾经痛加指斥的“阿Q精神胜利法”。对残酷的历史进行戏说，甚至胡说，把深重的苦难予以消解，甚至玩笑，并不能说明我们内心的强大，恰恰暴露了我们内心的虚弱。这对于我们客观冷静地认识历史，正确理性地面对未来，特别是越来越复杂紧张的亚太局势，以及教育下一代，全都有害无益。后来，也有几部关于川军出川抗战的电视剧开始播放，我同样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就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川军出川抗战虽然参加了众多激烈的战斗，作出了惨烈的牺牲，但并非像电视剧中所反映的那样，一路高歌猛进，神勇战斗，甚至成了某一战场的“救星”。实际情况是，川军出川抗战时，装备极其窳劣，士兵全都穿着破旧的单衣单裤和草鞋，甚至连像样的军用背包和水壶都没有，只能以四川常见的竹背篓和竹水筒来代替。我曾在一个西方记者留下的文字中，看见过一段对走向前线的川军的描述：衣着破烂、散散垮垮地走在大路上，士兵们除了背着破旧的枪支外，有的腰间还挎着吸食鸦片的烟枪；军官们则大多坐着轿子，有的甚至还牵着戏耍的猴子，远远望去，根本不像是一支军队，更像是一支逃难的队伍。所以，川军在出川抗战途中，曾受到很多冷眼与歧视：第一战区的程潜不要他们，第二战区的阎锡山也不要他们，最后被第五战区的李宗仁收留。但李宗仁在收留川军时说的一句话却让人刻骨铭心，永难忘记。李宗仁说：“诸葛亮草船借箭，也要用稻草人做疑兵。川军再差，总比稻草人强吧！”

于是，经过一番慎重而又痛苦的思考后，我决定写一部真实反映川人川军出川抗战的长篇小说。

我对抗战前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军事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我看到，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的近代化政治改革、工业化浪潮以及近代教育发展后，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与此同时，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彻底失败，后来清王朝又被推翻，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分裂的混战局面，而且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两国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抗战前，整个中国的工业总量仅有13亿美元，而日本却有60亿美元；中国的铁产量不足10万吨，而日本却有300余万吨；中国的钢产量不足1000吨，而日本却有640多万吨；中国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而日本却有六七艘航空母舰；中国的飞机只有300余架，而日本却有2700多架；至于战场上使用的机枪、大炮、坦克、装甲车等作战装备，那就更是比中国多得多，也先进得多。看了这些数据后，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的悲伤和痛苦油然而生。

此外，抗战之初的战场态势也让我甚感郁闷和悲凉：从1937年7月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军仅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就相继攻占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地区，掠取了我们的半壁河山。另有一个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也让我震惊异常：说是有三个日本兵掉队了，开着一个小火轮在寻找大部队的过程中，无意间来到了一个小县城，竟然统治这个小县城达几年之久，直至抗战结束。这让我非常震骇，也非常痛苦。于是，我开始把目光内转，从我们国家和民族内部来审视思考这场战争，来分析探究我们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我随即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日本已经大兵压境了，但蒋介石还作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和军事决策，甚至不惜借用日本人的手，来消灭地方军阀的势力，以达到他铲除异己，独裁中国的目的。至于对付共产党，他更是疯狂逮捕、屠杀，手段险恶卑劣，无所不用其极。

虽然八年抗战极其艰苦卓绝，极其惨烈悲壮，但我们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这又让我开始对另一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为什么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究竟存在着怎样强大的自我救赎力量？特别是四川在抗战前后的巨大变化，更是令我惊异不已：抗战前，四川一直处于军阀混战和武装割据的混乱局面，对中央政府多有抵牾与拂逆，且鸦片烟泛滥成灾，人心人性腐朽败坏，社会混乱不堪，被人斥为“烂摊子”，四川军人则成为人见人骂的“烂丘八”。但抗战烽烟一起，全川人民竟然迅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抗日的呼声和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前后共有350多万将士奔赴前线参加抗战，伤亡多达60余万人，为特种工程服工役的民工也在300万以上，且为抗战提供了8000多万担粮食和大量的捐税捐献，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定坚强的抗战大后方。由此我发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血性中，依然潜藏着强大的自我救赎力量。比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知耻者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等。中华民族饱经苦难，饱受创伤，但从未亡国灭种，且五千年绵延不绝，原因就在于此，力量就在于此。我们确有很多问题，很多忧伤，但我们更有严守的底线。无论是谁，无论它有多么强大，一旦触碰了我们的底线，我们必将拼死捍卫，并以饱蘸血泪的悲怆和勇毅，最终战胜对方。

2012年6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终于坐到了电脑前，郑重地敲出了小说的题目——川流不息，郑重地敲出了小说的题记——国难，是民族所有个人的命运之难，国殇，是民族所有个人的精神之殇。

我开始用文字，去发现并书写我的“抗战”——一个四川作家眼中的关于四川人独有的抗战故事与悲烈牺牲。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

新文快读

观我生与我观世——鲍贝小说读后

□邱华栋

有的作家，属于那种不声不响发生自我裂变的。鲍贝就是这样一位小说家。本来，浙江的青年作家这几年呈现出开锅的状态，有十几个青年作家的风头都很健，沸水奔腾，打开杂志，到处都是他们的作品占领头条。鲍贝在其中，属于低调的实力派，并不高调，却非常从容，勤奋，而具有内爆力。

鲍贝写有长篇小说多部：《空阁楼》《观我生》《你是我的人质》《独自缠绵》《书房》等，还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松开》，其中的短篇小说《空瓶子》《我爱张曼玉》获得了很多赞誉，她还出版了多部散文随笔，是她游走世界各个热闹地方和偏僻角落的心路。这些作品加起来，构成了鲍贝的文学形象：丰富、内敛、洒脱、冷静、超越、尖锐和犀利。无论是观察人性，还是观看世界，鲍贝带给我们的，都是经过了淬火的书写。

鲍贝最近出版了三本新书：《观我生》《书房》《空花》。《观我生》是老版新出，《空花》《书房》则是我第一次读到。拿到小开本硬皮精装，我完全被惊艳到了。从书名上看，像《书房》《空花》这样的名字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谈禅说佛的散文集。撕开书封才知道，《书房》和《空花》算是小长篇。

人靠衣装马靠鞍。我得承认，促使我阅读鲍贝的这三部小说的最初动机，是因为书做得太精致漂亮，以致于拿在手中有点爱不释手。另外，还有一份隐秘的好奇心也促使我静下心去读一读。就好比遇见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子款款走来，会下意识瞥一眼。这三本书让我们看到了鲍贝要建立的文学世界、文学眼光和她所关心的问题，这三本小说就是进入鲍贝小说世界的三条小径，通往一个洞察幽微人性的林中空地。

先说说《观我生》。《观我生》初版在2013年，时隔两年之后，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再版。先前那个版本我读到过，李敬泽的序言非常好，光是题目就惊艳无比：《天堂在虎穴中》。我相信，以这样一个句子来形容鲍贝，其独特性和犀利性，其动静之迅捷和身形之矫健，真如豺狼虎豹来到我们眼前一样了。

的确，一个人与一部小说的相遇，也是有它的缘分的。虽然现在的我们已不太愿意去说“缘分”二字，但它存在着，无处不在。在《观我生》里，也处处充斥着扑朔迷离的缘分，一场又一场，情缘或者孽缘，貌似巧合，却也暗合着某种宿命般的必然。小说写了一个中产阶级的女子“我”从天堂般的城市杭州出发，途经尼泊尔辗转到达另一个天堂般的国家不丹，一路寻找失忆的那个自己，路上所遇的奇缘层出不穷、巫幻森森。“我”所遇见的那个叫Frank的男人，经过一层层剥洋葱似的叙述，最后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叫贡布的喇嘛。当然，主人公“我”在路上遇见的喇嘛已不再是喇嘛的身份，他已还了俗。还俗的原因是爱上了一个女子，或者说，是遭遇了一场爱情。对一个生下来就出家从未经历过红尘的喇嘛来说，遇上爱情，注定万劫不复。

既然写到喇嘛，必然会涉及到宗教和信仰的问题。鲍贝有她自己的直接观察和体验。这跟她多年来多次去过西藏、印度、尼泊尔有关。据说，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是鲍贝去不丹的旅途中听一位藏族驴友所说，当时，让她大为震憾的并不是喇嘛与一个都市女人的爱情，而是，当那个女人把还俗之后的喇嘛带进红尘滚滚的花花世界之后，最终抛弃了那个喇嘛。那个喇嘛一生都在寺院里度过，除了念经之外什么都不会，在都市生活中毫无能力自理，他该如何生存？——鲍贝先是被这个问题给击中了。然后，她设置了一条与她自己走过的相同的路线，试图还原这个故事，再安排喇嘛经过重重艰难困苦，抵达另一个天堂不丹。那里是全民信佛的国家。喇嘛最后爬上不丹的虎穴寺跳崖自尽。当然，对于一名佛教徒来说，死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死是一场救赎，或者，是生命的另一种回归。这就让我们感到震撼了。

小说中的“我”亲历并见证了这场死亡，主人公似乎在恍惚之间，确定的却是死亡的事实。我想，鲍贝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也一定很苍茫。她内心苍茫于人的命运被神秘而不可知的色泽所笼罩，又仿佛被看不见的魔掌所控。人在迷茫或者需要自我救赎的时候，一般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宗教。然而，宗教真能拯救得了一个迷途中的人吗？小说中和喇嘛相爱却最终迫于现实不得不选择分手的那位女子，意识到自身的罪孽，带着身孕一路磕着长头去西藏，结果死于一场车祸。小说家的思想如闪电般划过天地，带有原罪的拷问，还有来自古希腊悲剧传统的宿命的因子。在鲍贝的小说中，每一个人都是可怜的，可怜地处于被命运所折磨和愚弄的地位，无论你贫富贵贱，无论你怎样挣扎和抗拒，都不能挣脱冥冥中那双看不见的手的拨弄。小说中的每一个人，也即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罪感，人人都生活在罪的世界里，自己有罪，并迫使他人有罪。

这种罪感，在另一部小说《空花》中也同样存在，并且更加深重和荒诞。

《空花》，听这名字就带有佛教的某种说法，或者说联想。小说由四个汉族女子的故事组成，她们在自己的城市里沉沦浮沉，各自经历了人世间的“残忍”与“冷酷”，不约而同地到了西藏，从拉萨结伴出发去转海拔接近7000米的冈仁波齐神山。对于佛教徒来说，转一圈神山即可洗清一生的罪孽。小说中的四个汉族女子皆非佛教徒，然而她们却决定冒着生命危险转山。其中一位的原型即是鲍贝自己。她与藏族佛教徒之间的一场纠葛，导致她愤然将对方告上法庭。她虽然赢了官司，但却无法驱散内心的迷津。于是，她带着混沌状态再一次走进西藏，并毅然决然踏上朝圣之途。与她同行的三位女子，其中一位坠崖自尽，另一位失踪。在一种极度的迷茫和混沌之中，鲍贝把自己关进书房，写了这部小说。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处于一种混沌状态的创作，内心的情感或许反而可以直接与上苍交流，抵达一种形而上的灵光，那是一种原始力的弥散。鲍贝让人惊异的地方正在于此，她绝不迎合抒情的、小资的、唯美的、俗气的审美期待，她顽强地走到一片十分幽深的林中空地，在那里，安静地捕捉人性之豹倏然闪过的身影。

可以说，《空花》延续了她前一部小说《观我生》的绝望与宿命的主题。鲍贝把每一个人物的性格和内心的复杂性把握得都很到位。她的努力和天赋是惊人的。她的作品总能带领你进入一个不能解释且布满迷津的道场。正因为不能解释，便有了让人思考的余地，小说的深广和静穆也便自然呈现。

鲍贝平时给我们的印象温润柔和，她活得优雅从容、无忧无虑。很难想象，她是如何一次次只身去西藏，为何冒着生命危险转山？相信在朝圣途中的她一定感知并获取了某种可以与天地自然打通的精神密码。在她的作品中，面对人性的荒原，她冷静地把藏匿于世界的隐秘和暗黑无情地拉扯出来，真切感和无力感令人措手不及。

相比《观我生》和《空花》这两部小说，《书房》明显要更贴近生活一些，更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在《书房》中的每一个人物，你都能感觉到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仿佛每天都在和我们交集着，息息相关，并惺惺相惜。小说中，怀才不遇的文教授以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作为对当下体制的一种对抗。然而，对抗带来的是更为不堪的生活，他最终沦为一个私人书店的临时配售员。鲍贝以洞察幽微的叙述呈现了一个落魄文人在这个时代无处安置的一种现状，对人物和命运的把握可谓炉火纯青。小说中的书房和书籍仅仅是道具，是通往自由生活的惟一途径和精神密码。小说中的那些人物，都是爱书之人。文教授、书店老板娘、李教授夫妇、李总、金万亿、温小暖……因为爱书交集在一起，不经意间在生活中演绎了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剧。

鲍贝借助这些人物，满怀忧伤地提醒我们：人的存在从来都不是诗意的，人生下来就走在死亡的路上，人的本质是悲剧。当然，并不是说，人反正是要死的，就不去好好地活了。相反，正因为生命短暂，我们更要好好地活，活出精神、活出自己。但是，我们是谁？我们到底在为谁而活？为了什么而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活着？……在鲍贝的每一部小说里，都存在着诸如此类的追问。

观我生，我观世，这之间，有着多么大的缝隙能让一个人穿过，鲍贝做到了，因此，她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小说家。她能出能入地游走在外部世界和人的内心，在这两者之间转换自如。看世界上的外部风景，却能描绘出人心和命运更加复杂而深沉、热烈而壮美、沉静而内爆的景象。这样的小说，好看而带有教益，像是一场探险，她绝不想让你一开始就如履平地，她期待的读者，也是胆大心细善于攀援绝境的会心人。

桃李天下

苏沧桑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其新作《守梦人》2015年9月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书写平凡人“生存之痛、人性之美”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作品选取了果农、入殓师、针灸师、机场打鸟队队员、空难调查员、安全监督员、黄鱼车夫、垃圾工、荣军护理员、油画家、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消防兵、地震幸存者等30例平凡人的人生个案，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他们的寒冷与温暖、疼痛与幸福，困顿与沉重、纠结与迷茫，诚信与仁义、善良与宽容，责任与担当、梦想与坚守，绘就了一幅斑斓的中国百姓生活画卷和梦想画卷。作者从新闻、文学和思想三个维度切入对生活的观照和表现，每一个文本都从一个人的“梦境”出发，以油画笔、手、鸟、日记本等“物体”的独特视角，深入挖掘附着在生活之上的美德之光、人性之光、希望之光。

吴文莉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叶落大地》近日由陕西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描述了1898年至1937年40年间，近5万山东人逃难到陕西，在这里开荒、扎根、融入，形成了渭北至今仍坚守着祖先文化传统的无数山东村的故事，还原了100年前中国式农民大迁徙、重建家园的生活原貌。这是一卷讲述山东人如何从山东漂流挣扎到陕西并落地生根的闯关中的生存传奇。整部小说历史与文学绵密交汇，将读者一口气带到叙述的终点，使细碎苦难的日子呈现出所有生活都需要的温暖、力量、尊严和人性之美。

杨仕芳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白天黑夜》近日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小说以一个边远地区的侗寨为背景设定，通过一个弃婴“我”成长经历的所见所闻为叙事线索，分别讲述了6个相对孤立却又形成有机整体的故事。情节想象大胆，将人物冲突推至极致，人物的命运、故事的走向又自成逻辑。作者细腻的文字表达把想象和逻辑牵在一起，把细节和情感揉成面团，在读者的心头发酵。

赵雁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第四级火箭》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描写了发射专家葛校言和沈西元两家三代人在世界风云变幻中，随着导弹腾飞、两弹结合、人造卫星上天、运载火箭飞向太平洋、飞船上天的历史进程，人生历尽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小说忠实记录了中国航天57年的发展历程，形象刻画出一群上至将军、下至科研人员及普通士兵和工人们开天辟地的群像，倾心书写了对那代人的敬意。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在社会动荡中，历经种种精神和肉体的磨难，最终让火箭飞过长天，成为捍卫国门探索宇宙的利剑。